

《三国志演义》互文性解读三题 ——以“仿拟”叙述为中心

王凌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陕西西安, 710062; 西安工业大学人文学院, 陕西西安, 710021)

摘要: 文本从诞生之日起就已处于一片意义的海洋, 它时刻与周围文本世界保持各种奇妙关联, 仿拟不过是这众多关联方式的其中之一。对《三国志演义》而言, 仿拟不仅是小说承袭、借鉴其它文本从而构建自身文本意义的重要方法, 同时也是小说以独特面貌出现于其它文本之中, 使其文本意义得以延续的重要方式。具体来说, 与周围文本之间的模仿、化用或戏拟等关系构成《三国志演义》互文性解读的主要内容。

关键词: 《三国志演义》; 互文性; 仿拟

中图分类号: I207.4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5)02-0201-06

“仿拟”作为一种积极修辞格是指出于讽刺和嘲弄的目的, 而对某种既定形式展开刻意模仿。^{[1](108)} 它同时也是一种特殊的叙述手法, 指“后人以一种神遇气合的方式仿效或拷贝前期经典叙述片段或叙述话语”^{[2](62)}。仿拟强调文本之间的承袭和模仿关系, 不论对于作者顺利实践这种技巧, 还是读者充分领会相应审美效果, 对原文本的准确把握都是重要前提。西方学者将仿拟与互文性紧密结合在一起, 认为“仿拟是基于原文基础的二次写作, 其内在特征仍然是互文性”^{[3](222)}。法国学者吉拉尔·热奈特对仿拟尤其重视, 他将仿拟进一步细分为仿作和戏拟两种形式, 并将其归入互文性的特殊类型——超文性。^①在互文性理论的视野观照之下, 仿拟的内涵超越微观修辞学意义, 其所指扩展到规模更大的整体模仿和袭拟, 《尤利西斯》对《奥德修记》故事框架的全面借鉴就是这种写作手法最具影响力的现代表现; 而放眼国内, 《废都》对《金瓶梅》的仿拟也堪称经典。^②

然而对文本之间这种特殊关系的关注并非始于现代。在尊史重实的我国古代社会, 文学创作强调一切皆“有所本”, 转益多师更成为文学创作者的必备素质, 文学批评也擅于在字里行间寻找作品与它者的关联。《三国志演义》作为我国最早出现的长篇白话小说之一, 丰富的史传文化背景、说书艺人及文人学者的世

代加工, 为其创造丰富的意义指涉空间提供了前提, 同时也为批评家们破译文字背后的文际关联提供了线索。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就明确指出: “施某所编《水浒传》, 特为盛行……其门人罗本, 亦效之为《三国志演义》, 绝浅鄙可嗤也。”^{[4](436)}如果说胡氏的推测还只是从作者渊源入手的知人论世式点评, 那么章学诚的分析则更有依据: “其书似出《水浒传》后, 叙昭烈、关、张、诸葛, 俱以《水浒传》中萑苻聚行径拟之。诸葛丞相生平以谨慎自命, 欲因有祭风及制造木牛流马等事, 遂撰出无数神奇诡怪, 而于昭烈未计委前, 君臣寮宰之间, 直似拟《水浒传》中吴用军师, 何其陋耶! 张桓侯史称其爱君子, 是非不知礼者, 《演义》直以拟《水浒》之李逵, 则侮慢极矣。”^{[5](卷三)}通过具体情节和人物设置等多方面的比较求证《三国》对《水浒》的仿效之实, 显然更具科学性。索莱尔斯认为: “每一篇文本都联系着若干篇文本, 并且对这些文本起着复读、强调、浓缩、转移和深化的作用。”^{[6](5)}从诞生之日起, 文本就已处于一片意义的海洋, 它时刻与周围文本世界保持各种奇妙关联, 仿拟不过是这众多关联方式(如引用、暗示、参考等)的其中之一。对《三国志演义》而言, 仿拟不仅是小说承袭、借鉴其它文本从而构建自身文本意义的重要方法, 同时也是小说以独特面貌出现于其它文本之中, 使其文本意义得以延续的重要方式。

收稿日期: 2014-11-05; 修回日期: 2014-12-12

基金项目: 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白话小说文体形式研究”(10k148); 西安工业大学北方信息工程学院院长基金项目“白话小说文体形成, 发展研究”(YZ1231)

作者简介: 王凌(1980-), 女, 湖南常德人, 西安工业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 主要研究方向: 元明清文学, 古代小说

一、叙事情景的正向借鉴

对历史内容进行通俗敷演以获取更大范围接受是以《三国志演义》为代表的历史小说基本的创作意图。这一初衷决定了此类小说与史传叙事之间的密切联系。但这种关联并不单纯表现在历史顺序的一一对应上,而是更多表现在情节素材、叙述方式以及情绪意蕴的借鉴、移用或模仿上。通过作者有意无意间透露的这些互文信息,我们感受到的是文本意义的无限流动性和参照性。

徐庶归曹是《三国志演义》中一处重要情节,曹操之奸与刘备之仁在这段故事中得到对照式表现。正因有此反差,元直才会在临行之际“走马荐诸葛”,为接下来的高潮(三顾茅庐)提供铺垫。在对该故事进行源流考证的过程中,学者们发现小说中的这段情景与三国史实并不完全吻合,却与《史记》《汉书》所载王陵故事颇为神似^{[7](3-7)},二者之间表现出明显的模仿痕迹。史载楚汉之争中,项羽曾以王陵之母为人质逼陵来归,陵母以高祖必得天下,为坚陵意而伏剑身亡,陵遂从汉王定天下。^{[8](350)}《演义》中曹操以徐庶母为质,又以程昱模拟徐母笔迹为书致庶,庶被骗归曹,庶母得知真相即羞愤自杀。二母之贤、烈如出一辙。事实上,《三国志》注者裴松之早就发现了两位女性之间的相似性,他曾在《魏书·程昱传》注引徐众评中特意提及王陵母事,并大赞刘备允许徐庶归曹的举动是“欲为天下者恕人子之情也”^{[9](259)}。《三国志·魏书·程昱传》)对此,清代评点家也有清楚认识,如毛宗岗就曾针对曹操“遂不杀徐母,送于别室养之”的举动夹批“不杀徐母者,惩于王陵故事也”。李渔也对此评曰:“操不杀徐母,有鉴于王陵故事也”。^{[10](452)}即明确将二事进行对比。《三国志》本身对徐母的记载有限,虽然在其后的《诸葛亮传》中也有关于曹操“获庶母”、徐庶“遂诣曹公”的记述,但并未对徐母形象进行着力刻画,更未有徐母见徐庶归曹而羞愧自刎之结局。小说创作者极有可能是在陈寿的提示之下,有意将王陵母经历移植于徐庶之母,通过移花接木的方法将历史情景再现于小说文本之中。当然,这也绝非小说最后写定者的一人之功,有学者在经过详细考论就曾指出,《史记》《汉书》虽为《演义》中徐母形象的塑造提供了原始素材,但经过民间加工的通俗文学,如唐代出现的《汉将王陵变》、宋代说《汉书》话本中的陵母故事等则为《演义》人物的形成提供了直接借鉴。^{[7](3-7)}除了人物塑造之目的之外,小说对于史书情

景的模仿也许还隐藏着更为深刻的主题意蕴,即将曹、刘之间的较量比拟于楚汉纷争中项羽与刘邦之间的争斗,宋儒以汉代得天下为正而坚持尊刘抑曹思想,在小说故事的演绎中得到具体而明确的表达。^③

除了情节过程的有意模仿之外,小说在局部意境上亦不时表现出与其它经典的互涉性。如《演义》第十三回叙汉献帝与皇后为避李傕、郭汜之乱而仓皇出逃,“岸上有不得下船者,争扯船揽,李乐尽砍于水中。渡过帝后,再放船渡众人。其争渡者,皆被砍下手指,哭声震天。”毛宗岗指出此处深得《左传》叙事之妙。据“宣公十二年”所记,晋楚郟之战中,晋军在楚军追杀之下仓惶退兵,中军大夫赵婴齐因提前备有船只而抢先渡河,中军余部和下军退至河边为抢夺船只不惜互相砍杀,于是出现了“舟中之指可掬”的惨状。^{[11](420)}《左传》作为历史经典,其对战争伤痛的描写已经作为特殊阅读记忆存储于读者内心,一旦为小说叙述所激活唤醒,便使读者获得了延伸解读的契机。面对战争的惨烈,谁能做到真正的淡定?无论是战败的晋军还是跟随献帝渡河的汉军,他们的惨痛经历何其相似乃尔?又《演义》第五十二回赵范的寡嫂形象亦容易让人联想到宋元话本《三现身包龙图断冤》中大孙押司娘子。大孙押司娘子在丈夫去世之后,提出三个改嫁条件:“第一件,我死的丈夫姓孙,如今也只要嫁一个姓孙的;第二件,我先丈夫是奉符县里第一名押司,如今也只要恁般职役的人;第三件,不嫁出去,则要他入舍。”^{[12](59)}而《演义》中赵范亦对赵云转述其寡嫂所提之改嫁要求:“第一要名动当今,人才出众;第二要与汝兄同姓,旧曾有识;第三要文武双全。”^{[13](401)}两位女性早有明确的改嫁目标(押司娘子想名正言顺嫁给情人小孙押司,在此之前二人已合谋将大孙押司杀害;赵范以桂阳太守身份投降赵云之后,欲结交赵云,遂欲将寡嫂嫁于赵云),所提条件云云不过为掩人耳目寻求舆论支持而已。虽然在此无法明确判断两部作品出现的先后,但不能排除《演义》向民间说书中的特殊题材类型(如小说中的公案类等)进行借鉴的可能。又程毅中先生曾论及《梁公九谏》中狄仁杰不畏油锅而坚持进谏之事,认为“这种手法常见于民间说唱,是故作惊人之笔。元人杂剧《赚蒯通》和《三国志通俗演义》第十八卷邓芝使吴一节,就使用了这样的情节,可见其间有相通之处”^{[14](264)}。为我们探寻《演义》与其他文本之间的互涉关联提供了又一佐证。除此之外,十六回吕布辕门射戟的情景与《水浒传》中的花荣射雁(第三十四回)亦颇有神似之处;曹操对吕伯奢的猜疑与《伍子胥变文》中伍子胥对渔人的疑心也颇为雷同……诸如此类,难以遍举。有了

这些经典叙述作为参照背景，读者往往能在小说阅读中获得更加丰富的情感体验。

二、主题意蕴的逆向戏拟

戏拟是“对一篇文本改变主题但保留风格的转换”^{[6](47)}，“戏拟谋略的采用乃是受现实生活的刺激，认清了旧叙事模式的不适用，因而在叙事模式和生活的错位之间采取嘲讽心态。戏拟式的嘲讽是一种新鲜的智慧”。“是对传统叙事成规存心犯其窠臼，却以游戏心态出其窠臼”，是一种“创新手腕”^{[15](86)}。戏拟效果的取得首先要求戏拟对象具有一定的经典普及性，只有读者对原文本具有较高的认知程度，其反讽效果才容易得到辨识；其次要求作者对原文本叙事意蕴的深入把握，而调侃和戏谑的心态也是必备要素。

《三国志演义》作为历史叙事的经典代表，其对后世文学创作影响巨大：既有作品通过正向模仿方式表达对小说的尊重与继承（如《列国志传》《隋唐演义》等），也有作品（如《儒林外史》《金瓶梅》等）通过戏拟、解构的方式完成对经典的延续。而一旦引入这些后续作品作为参照，我们对《三国志演义》的理解也可进入一个新的高度。

以《儒林外史》中娄公子三访“贤人”杨执中的情节为例：相府二公子得知市井儒者杨执中身陷囹圄，立即慷慨解囊助其摆脱官司，事后又主动前往访贤，不料两番不遇，后时隔余年方在老家人邹吉甫引见之下正式会面，三人遂相谈甚欢。此情节在具体叙述中多次表现出对“三顾茅庐”的文本指向：如娄公子对杨执中的倾慕起因于他人的推荐，前两次求访皆因人物的外出而不成，二访不遇的娄公子又从摇船者口中听到杨执中诗作，更加深对贤者的仰慕等，皆与《演义》中刘备访孔明经历一致。而鲁编修对杨执中名不副实的推测性评价亦与关羽、张飞起初的看法神似。当然，作为一部具有突出反讽意识的小说，《儒林外史》的作者将文本表述指向《演义》还另有其深意，即通过对“三顾茅庐”情节进行表层的模仿以解构其明主求贤的原始内涵：比如令娄府二公子倾慕不已的杨执中其实并非什么真儒大贤（作者显然将其归入权勿用等迂腐无能的假名士一流），而娄公子对他的尊敬也不过因为在愤世嫉俗的情绪上取得了某种一致，外加对礼贤下士声望的追求。作者为这些人物安排的表演越接近《演义》，其精神实质的不符就越容易造成讽刺和戏谑的效果^{[16](58-61)}，吴敬梓通过对经典文本的模仿与戏拟构建了独特的反讽模式。而透过这种反讽式解构，

“三顾茅庐”所传达出的“仁主求贤”母题也能得到更加深刻的认识。事实上，《史记》所载周公“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战国策》所记秦昭王为求治国之策向范雎三次行跪拜之礼，以及《演义》中刘备自述“齐桓公欲见东郭野人，五反方得一面”等故事，与三顾茅庐一样，皆为表现仁主求贤之诚意。君臣之间的和谐相处作为我国古代文人的最高理想在这一母题中得到了充分反映。当然，在叙事过程中，小说也突出我国古代文学中反复出现的“事行三次始得成功”的原始架构。^{[17](72-76)}

桃园结义是《演义》中的另一个经典情节，异姓兄弟因相同的信念追求而团结一致，从此演绎一段不离不弃的生死之谊。这个开端不仅为接下来的情节发展奠定了叙事基础，而且契合了国人重情重义的精神追求，为表现小说的“忠义”主题起到重要作用。颇有趣味的是，小说《金瓶梅》也以西门庆与异姓兄弟的结义开始故事，只是“热结十兄弟”少了桃园结义的崇高与真诚，却多了游戏人生的低俗与滑稽。细较之下，热结十兄弟对桃园结义的戏拟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结义的初衷。刘、关、张生于黄巾起义的汉末乱世，“破贼安民”（刘备语）、“同举大事”（张飞语）成为三人共同的追求。而在《金瓶梅》中，西门庆则仅仅因为“只管恁会来会去，终不着个切实”，若能结拜了兄弟，“明日也有个靠傍些”。比之刘关张匡扶汉室的宏图大略，西门庆的目的已落世俗，而月娘接下来的描述更将西门庆一厢情愿的意图轻松解构，“只怕后日还是别个靠的你多哩。若要你去靠人，提傀儡儿上戏场——还少一口气儿哩。”其次是结义的过程。桃园结义中张飞仗义出资，兄弟间不拘小节，英雄们豪爽大气的性情品质跃然纸上。而热结十兄弟中，虽然西门庆提议大家“随多少各出些分资”，但实际的结果却是“只有应二的是一钱二分八成银子，其余也有三分的，也有五分的，都是些红的黄的，倒像金子一般”（月娘语），贪占便宜的帮闲嘴脸如画。接下来的结义誓词甚至还特意提到桃园故事，其云：“伏为桃园义重，众心仰慕而敢效其风；管鲍情深，各姓追维而同其志。况四海皆可兄弟，岂异姓不如骨肉？”^{[18](6-14)}桃园之情、管鲍之谊被西门庆等乌合之众煞有介事地搬来以作榜样，亦显得幽默滑稽。最后，十兄弟之间的实际情谊与这信誓旦旦的承诺对比起来更显讽刺。《演义》中刘备闻关羽死讯“三日不进水食，但痛苦而已，泪湿衣襟，斑斑成血”。“张飞自守阆中，闻知关公被东吴所害，旦夕号泣，血湿衣襟”^{[13](602)}。兄弟三人从未违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的结义誓言，生死情谊令人动容。而《金瓶

梅》中与西门庆关系最密切的应伯爵在“大哥”死后立即转而趋附同为富户的张二官,连为大官人祭奠之事也为的是“又讨了他值七分银子一条孝绢拿到家做裙腰子;他莫不白放咱每出来?咱还吃他一阵;到明日,出殡山头,饶饱餐一顿,每人还得他半张靠山桌面,来家与老婆孩子吃着,两三日省了买烧饼钱”。这与西门庆生前对待众人的慷慨豪爽形成巨大反差,难怪叙述者忍不住在此发表议论:“但凡世上帮闲子弟,极是势力小人……当初西门庆待应伯爵,如胶似漆,赛过同胞弟兄,那一日不吃他的,穿他的,受用他的。身死未几,骨肉尚热,便做出许多不义之事。正是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19](1130)]与“桃园结义”的故事原型比较起来,这段描写充满戏谑和反讽。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的没落乱世在这看似随意幽默的笔调之中尽显悲凉。不仅明清小说已经开始对经典叙事进行戏拟尝试,当代小说中亦有热衷于此者,刘震云《故乡相处流传》中,《三国志演义》原有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历史规律被戏谑地调侃为一个女人引起的利益之争。这种对经典无情的解构与颠覆也成为后现代叙事的重要特征。

三、意境化用与格调模仿

作为一种综合性的文学文体,小说表现出比其他作品更强大的包容性。巴赫金认为:“长篇小说允许插进来任何不同的体裁……从原则上说,任何一个体裁都能够镶嵌到小说的结构中去,从实际上看,很难找到一种体裁是未被任何人在任何时候插到小说中去。”^[20](106)]小说体裁的包容性邂逅历史题材的重实性,为仿拟技巧的运用提供了实践空间。对于《三国》这类具有相当依据的演义小说而言,作者不能做凭空的自由发挥,故事中人物的表章书信、诗作应答,甚至言谈举止等皆因有大量历史资料的参照而表现出更多的制约性,而化用、拟作便成为非常实用的技巧而得以广泛运用。

第一,化用。以小说五十六回叙曹操大宴铜雀台情景为例,面对众人进献的赞贺之诗,曹操表明自己不欲篡汉自立的意图:“孤本愚陋,始举孝廉。后值天下大乱,筑精舍于谯东五十里,欲春夏读书,秋冬射猎,以待天下清平,方出仕耳。……如国家无孤一人,正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或见孤权重,妄相忖度,疑孤有异心,此大谬也。”这段表述为曹操奸诈狡猾的文学形象提供了有力支撑,其内容则明显化用历史上曹操的传世名篇《让县自明本志令》而来。据史志记

载,公元210年,曹操借退还皇帝加封三县之名特作此文以剖白心迹,目的是反击朝野对他的“篡汉”抨击(《三国志·魏书》)。^[19](19-20)]文章一方面强调自己不欲篡汉自立的心意,另一方面也表示绝不会因为舆论压力而放弃权力,言辞大胆却又直率坦白,传达出奸雄霸气又可爱的一面。不过,小说对曹操形象的表现具有倾向性,在化用此文时就有意将本义弱化,而代之以曹操的篡位野心。^[21](75)]又小说第三十六回,刘备不舍徐庶的离去,分手后仍立于林畔怅然若失,有学者认为这里明显化用了岑参《白雪送武判官归京》(雪中送别)及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水边送别)中的意境^[22](90-99)],皆以主人的伫立怅望来表现对友人离去的不舍,意境优美,颇具感染力。《三国》擅长叙述金戈铁马的历史征战,但在表现个人情感方面,亦有如此细腻精致之笔,实属不易。紧接其后,刘备又突发奇想欲砍去眼前树林,只因其阻挡了自己远望元直的视线。毛宗岗读至此处时更指出这是对《西厢记》曲中“青山隔送行,疏林不作美”意境的化用。事实上,作者并不一定是非常自觉地引入这些唐诗宋词元曲,但无论对作者还是读者而言,经典所创造的优美意境已经作为固有的文化背景根植于心灵深处,一旦被外界某种情景激活,必定获得强烈的共鸣,这正是文本之间通过互文构建的独特审美景观。

第二,仿作。“孔明三气周公瑾”一节中,诸葛亮识破周瑜的假途灭虢之计,遂致书一封劝其不要轻易攻取西川,周瑜得书恼恨身亡。事实上,这封书信并非出于小说作者独创,而是模仿历史上刘备的书信而来。根据《三国志》裴注引《献帝春秋》的叙述,谋取西川乃出于刘备自己的意图,他曾因此书面回绝孙权与之联手入川的请求,表现出政治家在征战中的精明与霸气。小说作者则改变了历史真实,试图通过有意贬低刘备的能力而突显诸葛亮的智慧,同时将刘备的仁义作为其重点表现对象,于是刘备的谋略变成了诸葛亮的计策,而史书所载的刘备致孙权书信也被移用到了诸葛亮身上。将《演义》书信与《三国志》所录作一对比,表述上的雷同一目了然(《三国志·蜀书·先主传》)。^[9](525-526)]也许正是为了有意避免抄袭之嫌,毛宗岗就在嘉靖本的基础上对书信内容进行了一定简化。^④对历史故事进行适当改造,以更好服务于人物形象塑造和主题表达,说明作者虚构意识的觉醒。《三国志演义》正是由于在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之间创造平衡而获得雅俗共赏的良好口碑。^⑤《演义》为塑造出各具特色的文学人物大量使用了“张冠李戴”“移花接木”等法,从本质来说正是一种特殊的仿拟技巧。

第三,拟调。小说中另一种值得关注的重要仿拟

现象是频频出现的仿咏史诗词。承袭说书活动中韵散结合的表述方式，白话小说的散文叙事中往往夹杂大量诗词韵语。《三国志演义》作为历史之作，其对咏史诗的偏爱表现得尤为突出，前人胡曾、周静轩的咏史之作就被大量引入。但这些仍远不能满足作者针对人物、情节进行随时吟咏、慨叹的需要，于是作者便直接以小说所述为对象，模拟史官口吻拟传统咏史之格进行诗歌创作。第三十八回针对孔明出山插入的带预叙性质的诗歌，四十回赞孔融之诗，五十七回叹周瑜之诗等皆为此类。^{[23][150]}咏史诗与仿咏史诗的根本区别在于吟咏对象一为正史内容，一为小说内容(文学虚构)；而在“隐括本传”“多摭胸臆”(清何焯语)的创作方法上两者并无二致。^{[24][893]}这种情形庶几可归入仿拟的“拟调”之格。仿咏史诗的明确针对性克服了直接引用前人咏史所无法避免的适用性缺陷，使得小说的韵、散搭配更加自然贴合。而对传统咏史格调的模仿则为小说叙述增添了庄严厚重、含蓄蕴藉的审美风韵。据统计，《演义》嘉靖本、李卓吾评本以及毛本分别所存 341 首、411 首、206 首诗作中，半数以上属仿咏史之作。这类诗作在白话小说(尤其是历史演义类作品)中广泛存在，形成了文学史上独具特色的创作景观。

四、结语

杰拉尔德·普林斯曾为互文性下过一个清晰易懂的定义：“一个确定的文本与它所引用、改写、吸收、扩展、或在总体上加以改造的其它文本之间的关系，并且依据这种关系才可能理解这个文本。”^{[25][72]}这个定义触及文本意义的生成与文本解读两个层面，从而也就使得“互文性”成为无法回避的理论范畴进入文学研究者视野。从以上对《三国志演义》的互文性分析来看，无论是《演义》对《史记》《三国志》等前作的模仿、借鉴，还是《金瓶梅》《儒林外史》等后作对《演义》的戏拟、解构，无不表现出经典之作其文本意义的流动性与文学魅力的永恒性，这也是互文性带给文学研究的普遍启示。任何文本都产生于前文本共同作用形成的文化语境之中，也必将在不断扩展的文本海洋中得到解读。如此，文本之间这种种奇妙的互文性关联就成为破译文本意义的关键，而“仿拟”正是这诸种复杂关系中较为特殊的一种。艾略特认为诗人最突出的能力就是“把一切先前文学囊括在他的作品之中”，因为这样就能使“过去与现在的话语同时共存”^{[25][73]}。而通过何种方式“囊括”前作，是正向的模仿参照，还是逆向的戏谑颠覆？不同的作者会做出

自己独特的选择。

注释：

- ① 热奈特曾如此解释：“我用超文性来指所有把一篇乙文(我称之为超文)和一篇已有的甲文(当然，我称之为底文)联系起来的关系，并且这种移植不是通过评论的方式来实现的。”参见(法)蒂费纳·萨莫约著、邵炜译《互文性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40 页。但根据翻译习惯的不同，也有将“超文性”译为“承文本性”的，如“(承文本性指)任何连结文本 B(我称之为承文本)与先前的另一文本 A(我当然把它称做蓝本了)的非评论性攀附关系，前者是在后者基础上嫁接而成。”参见(法)热拉尔·热奈特著、史忠义译《热奈特文集·隐迹稿本》，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74 页。
- ② 关于《废都》对《金瓶梅》的仿写，学界多有论述，如朱慧琴《〈金瓶梅〉与〈废都〉互文性研究》(学位论文)、孙涛《都市“恶之花”：〈废都〉与〈金瓶梅〉的文本互读》、史静静《〈金瓶梅〉与〈废都〉主要女性形象塑造手法互文性分析》、王奥玲《〈废都〉与〈红楼梦〉和〈金瓶梅〉三本小说之比较》等。
- ③ 根据苏轼记载“王彭尝云：途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蹙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则喜唱快。”可推测“拥刘反曹”思想至晚在宋代已得到普及。参见(宋)苏轼撰，赵学智校注《东坡志林》卷一“怀古”类，三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9 页。
- ④ 对比嘉靖本与毛本两段情节可知，前者参见沈伯俊校注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卷十一，第一百十三回，第 432 页；后者参见孟昭连等校注《毛宗岗批评本三国演义》第五十七回，岳麓书社 2006 年版，第 446 页。
- ⑤ 关于《演义》中书信文体的仿作问题刘博仓在其专著中曾做过比较详细的论述，参见《〈三国志演义〉艺术新论》第一章第三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33-49 页。

参考文献：

- [1] 陈望道. 修辞学发凡[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7.
- [2] 杨彬, 李桂奎. “仿拟”叙述与中国古代小说的文本演变[J]. 复旦学报, 2011(6): 62-63.
- [3] 赵渭绒. 西方互文性理论对中国的影响[M]. 成都: 巴蜀书社, 2012.
- [4] 胡应麟. 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十一[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9.
- [5] 章氏遗书外编卷三[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2.
- [6] 蒂费纳·萨莫约著. 邵炜译. 互文性研究[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3.
- [7] 杜贵晨. 《三国演义》徐庶归曹故事源流考论——兼论话本与变文的关系以及“三国学”的视野与方法[J].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2003(1): 3-7.
- [8] 司马迁. 史记卷五十六[M]. 武汉: 崇文书局, 2010.
- [9] 陈寿撰, 裴松之注. 三国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 [10] 陈曦钟, 宋祥瑞, 鲁玉川. 三国演义会评本[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6.
- [11] 洪亮吉. 春秋左传诂[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 [12] 程毅中. 宋元小说家话本集[M]. 济南: 齐鲁书社, 2000.

- [13] 沈伯俊校注. 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M].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08.
- [14] 程毅中. 宋元小说研究[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8.
- [15] 杨义. 《金瓶梅》: 世情书与怪才奇书的双重品格[J]. 文学评论, 1994(5): 86-88.
- [16] 安如雷. 从互文性看《儒林外史》的讽刺手法[J]. 明清小说研究, 1997(1): 58-61.
- [17] 周建渝. 多重视野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 [18] 汝梅, 齐烟校点.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第一回[M]. 香港: 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 1990.
- [19] 陶慕宁校注. 金瓶梅词话[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
- [20] 巴赫金. 史诗与小说[C]// 白春仁, 晓河译. 小说理论.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
- [21] 刘博仓. 《三国志演义》艺术新论[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 [22] 刘永良. 《三国演义》的抒情艺术[J]. 明清小说研究, 2002(1): 90-99.
- [23] 王凌. 毛本《三国演义》诗词的互文性解读[J]. 南京师大学报, 2014(2): 150-152.
- [24] 何焯. 义门读书记卷四十六[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 [25] 程锡麟. 互文性理论概述[J]. 外国文学, 1996(1): 72-73.

Three topics on intertextuality of *The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with “Parody” narrative as the focus

WANG Ling

(School of Literature,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China;
College of Humanities, Xi'an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Xi'an 710021, China)

Abstract: Ever since the date of birth, a text has maintained all kinds of wonderful associations with the surrounding texts, and Parody has been one of such associations. As far as *The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is concerned, Parody is an important way not only for the novel to inherit and borrow from other texts, but also for the text to make its unique appearance in other texts so as to extend its intertextual meaning. Specifically speaking, imitation, utilization and parody with the surrounding text constitute the main contents of intertextuality study of *The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Key Words: *The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intertextuality; Parody

[编辑: 胡兴华]